

文化的整体功能与编辑的创造性价值

陈 琦

作者 陈琦, 武汉大学出版社编辑,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编辑 文化整体功能 编辑的发现

提 要 本文将“编辑的发现”作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三大标志”之一, 比较详细而深入地阐释了编辑主体的创造性价值在文化积累、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等各个环节中的体现; 同时, 从文化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三方面探析和论述了编辑的重要作用。

有人说, 人类历史的进步, 是以“三大发现”为标志的: 第一次是“人的发现”, 它使人类摆脱上帝的桎梏而有了自主意识, 在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充分地发挥主体创造性作用的情况下, 人类历史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并因此而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大门; 第二次是“儿童的发现”, 它使人类真正意识到了智力开发的重要性, 在及早开发儿童智力的热潮中, 现代教育体系随之确立, 这不仅为人类智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为“知识爆炸”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准备了条件; 第三次是“妇女的发现”, 它使人们终于认识到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在妇女的聪明才智得到空前发挥的情况下, 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增加近一倍。至此, “人的发现”才算是全面的整体的, 人类的能力和智力才算是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掘。

真是无独有偶, 文化的进步同样可以“三大发现”为标志: 第一次是“作家的发现”, 它以发挥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基础, 将文化的创造带入完全自觉的时代, 在各抒己见各逞异彩的竞相角逐中, 文化成果极大地丰富起来, 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这也是“人的发现”所带来的硕果之一; 第二次是“读者的发现”, 它使人们认识到读者在文化接受特别是文学接受中的主体创造作用, 他们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和“前理解”去填补“空白”或重新解释“文本”, 更可通过“期待视野”去左右作家的创作, 这就将文化创造活动从“文本”的束缚和少数“精英”的垄断中解脱出来, 从而成为流动于创造与接受过程中的“活文化”; 第三次则是“编辑的发现”, 亦即编辑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创造价值的确立, 这一“发现”是近十几年才有的事, 但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

二

如林穗芳认为，“编辑学”这一术语，在国际范围内很可能是我国首先使用的。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苏联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学教授大纲》一书，导致“编辑学”一词首次在中国出现^①。尽管翻译者将“编辑课”译为“编辑学”有点偶然，但“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在中国建立则是一种必然。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何以唯有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延续不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编辑在文化积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几千年的编辑实践传统，编辑学首先在中国建立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那么，从编辑实践看，编辑者参与文化创造的主体创造价值究竟在哪里？

不妨先看看编辑者在文化保存和文化积累方面的贡献。在这一方面，编辑的主体创造性虽然体现得不够明显，但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实际功效绝不可低估。因为任何发明创造，都必须以前人的材料作基础，离开了前人的材料，文化创造便只能原地踏步，而绝不会有发展进步。试想，先秦的“百家争鸣”，若无其后学者辑录成书，不仅这一辉煌的文化景观后人无由得见，汉代的“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经学地位均无由出现，更不会有今天的“新儒学”，试图给现代工业化找到“动力”的奢望了。因此，保存和积累作为文化发展的前提，它本身就是文化创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创造性亦潜存于其中了。

若以体现“中国特色”的编辑传统而论，刘向父子当属首功。作为由中央政府直接组织校理群书的第一例，其开创性功绩自然不能由他们所独领，但他们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尽量全面地搜寻辑录而决不偏废，这种文化保存与积累方面的自觉意识恐怕是前人所没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厘定了一套编辑规范，并按照这一套编辑规律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分类整理。这不仅使文化传播大行其便，更使中国文化由混沌一团的单向度发展开始向学科分类的多向度发展。尽管刘向父子的分类方法不够科学，但因他们的分类而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精度和深度效应，仍不是单个作家的创作努力所能企及的。尔后的官方编书，分类标准虽有变化，但基本思路却仍是依循他们的故道。

刘向父子的功绩还有一点不容低估，那就是他们把所有的典籍都集中起来，于分类中见出整体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其缘由自然是复杂的，但各类典籍的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为各类典籍如不能结成一体，文化成果自身流失的可能性姑且不说，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社会很可能会因文化基因的偏失而畸形发展，并由此而导致文化传统的错位甚或断绝。如古希腊哲学如此超重其他文化门类而成为社会的主宰（所谓“哲学王”），最终因追索终极“真理”——“绝对理念”而导入了神学的虚空，让“上帝”统治欧洲上千年，而古希腊的优秀传统却被中断，到了16世纪才得“复兴”。不管欧洲的神学统治时期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黑暗时期”的出现则决不是人类的幸事，故而这种文化基因的偏失也决不是好事。

当然，决不能说编辑的功用只在积累。仅有此，尚难真正体现编辑的创造性价值。事实上，编辑还可以通过对某些文化成果的刻意编选和推崇，体现出自己的文化倾向，并进而引导出一种新文化现象。仅从文学史的发展情况看，昭明太子编《文选》，将文学带入到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自此步入独立发展的新领域；赵崇祚编《花间集》，引出花间词派一脉，一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仍是余韵犹存；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开创唐宋派并进而影响到晚清桐城派古文一系……如此等等，尽管某些流派的末流对文化的发展可能还有消极的影响，但编选者所欲引导的主观意图却已达到。后期末流的消极影响只能说明后继者的创新意识不足，一味地墨守成规，这又恰好从反面证明编辑者对文化发展的创造性价值不容轻视。

到了现代，编辑以自己的“选本”为武器参与社会思潮和文化斗争的目的则更加明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编辑者的目光已开阔得多，他们决不满足一两部书的作用，而往往推出一整套丛书系列；更为多见的是，以某种或几种刊物为阵地，这其实是更灵活、更有效的“丛书系列”。此类“丛书”的巨大影响力，自然是以前的“选本”所难企及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中国新文化新思想乃至社会革命的巨大推动

作用自不待言,因为历史的巨腕已为它写下厚重的一笔;再如《小说月报》《创造周刊》之类刊物,其开创性影响虽远不及《新青年》,但新文学乃至新文化借助于它们才算站稳脚跟,蔚成大观,故而在文化发展史上,亦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和茅盾等人被后人所瞩目的,大致是他们头上的思想家或作家的光环,作为编辑家的功绩则几乎无人记起。其实,作为集体力量的联结枢纽和凝聚点,编辑家在文化整体建设方面的作用甚或超过单个的思想家和作家,故而作为《新青年》和《小说月报》主编的陈独秀和茅盾更应被人们所记起。

无独有偶,《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作为其主编的赵家璧却鲜有人提起。其实,赵家璧通过《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是全面地保存了“五四”新文学的成果;二是击退了当时的复古之风;三是开创了编“大系”的传统,不仅使“文学大系”延续不断,更有“教育大系”等丛书问世。有了这三重功绩,赵家璧在编辑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创造性作用均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延至当代,似乎出现了另一逆转:编辑往往通过某一刊物提出某一观念或打出某一旗号,从而去引导并规范某种创作,使得作家常常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而将创作变为某种观念的诠释。正因为编辑对文化创造的这种左右力量,使得有人称他们为“无冕皇帝”。

当然,决不能将编辑的作用过分夸大,离开了作家,编辑的创造性便失去了依据。但是,当代编辑地位的提高和编辑作用的加强却也正是必然之势。这—是因为“信息社会”的需要所致;二是因为读者地位的提高使然。从信息传播的需要看,信息量越大,越复杂,就越需要“把关人”。有了“把关人”,才能保证文化生产总体上的平衡,不至于造成某些品类缺失而某些品类又畸形发展;同时,才能做到选择优化,保证文化产品的质量。从读者的地位看,“期待视野”的作用更多地也是通过编辑去影响作家的。作为“中介人”,编辑在读者与作家之间的联结作用亦是不可或缺的。

三

以上主要是从编辑实践方面分析了编辑的创造性价值由隐而显的过程,但仅有这种实践的分析似嫌不够。下面意欲换一个角度,作一点理论性的探讨。

首先不妨借助一下结构主义的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模式发展为结构主义方法论,已渗透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所强调的不仅要从小个别成分去认识事物,而且要从成分之间的关系即结构的整体性上去认识事物的方法,对我们研究文化成果的整体功能极有启发性。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三个特点。结构的整体性是指结构内部的融贯性,即各个成分在结构中是有机的联系,而不是各自孤立的简单混合,整体与其成分都由一个内在规律所决定,整体的意义决不等同于各孤立成分的意义相加。就文化成果来说,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应该说,最初的文化成果所反映的实则是客观现实的“云团”,各种成分在结构中的界线很不清晰,这就决定了文化成果从一开始就是以其整体性功能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远古时代的典籍总是融当时的文化成果于一书,便是这种整体功能使然。但是,融成一书虽有利于整体功能的发挥,却不利于各类知识的精细研究,从而妨碍了人的思维向深度发展和文化成果向广度的丰富,学科分工便越来越细,而学科分工越细,人的认识就越可能趋向片面、偏颇,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现象便势所难免。如何弥补这一缺憾,将各学科的精华凝成一个整体推向社会,使之既不失其学科之精华又能发挥整体功效,这既是编辑面临的难题,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能直面自己的责任,解决好这一难题,编辑的创造性价值也就体现于其中了。

从整体功能讲,中国的“六经”能统治思想界两千多年,其缘由亦大致如是。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民族,维系社会的稳定以事农耕乃是根本,而作为互补的“六经”恰是从各个方面为农耕服务:“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②“六经”合在一起,便发挥了整体功效,所谓“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缘道”。这“道”也

就是具有农耕文明特征的现世精神,它要求人们各安其分,各守其本,然后再进而“修齐治平”,为维系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那么就可以天下太平人逢盛世了。“六经”的社会功效,虽说不能完全归之于编辑者的功劳,但它无疑是与编辑者有关的。在先秦,“六经”并不只是儒家的经典,庄子称它们为“古之道术”,正说明它们是诸子百家“方术”的共同渊藪。那么,作为共同渊藪的集大成者——编辑者,其辑录成书的奠基性功绩就是不容忽视的。后来,汉代刘歆编《七略》,将“六艺”亦即“六经”置于“六略”之首,尔后各种“全书”都循刘歆之成例,这在强化“六艺”的经学地位,更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功效方面,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在文化成果的整体功效或曰结构的整体性功能方面编辑起的是奠基性作用,那么在文化成果的更新或曰结构的转换性方面则起的是引导性作用。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结构的转换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止的,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在控制着结构的运动发展。就语言来说,它按照自身的转换规律,由旧的句子转换出许多新的句子。而文化成果的转换,同样有自身的规律。怎样利用这一规律,由旧的文化成果转换出许多新的文化成果,则最能体现编辑能耐,也最能体现编辑创造性价值的所在。如由“六艺”而成“六经”并进而衍化成体系庞大的“经学”,其研究专著据《四库全书总目》所录竟多达1773部,这还不包括大量佚书及乾隆以后的经学专著,足见其转换出来的新的成果之多;由“六经”转换出来的新著数量虽然大得惊人,但却无多少新质,而《文选》将文学带入自觉的时代,使文学创作不仅有了许多新量,亦有了某些新质;到《新青年》的出现,将文化创造带入一片新开地,则是一种新质新量的全新转换。在这里,编辑所利用的规律也就是“推陈出新”,这也正是文化发展的内部规律。顺应了这一规律,结构的转换才是自然的,文化的发展才是健康的。而推动文化健康发展的杠杆,也就是编辑的创造性劳动。

结构的第三个特点是自调性,它是指结构由于内在的规律而自行调整,结构内某一成分的改变必将引起结构内其他相关成分的改变。因此,必然重视“共时性”研究,对于相关的现象,只有在同一结构系统中才有意义,也只有在同一结构系统中才能加以理解。这一理论对我们考察文化成果的自调性变化以及利用这一自调性变化而更有效地发挥编辑的创造性作用,或许更有实际意义。

所谓结构自调的内在规律,其实也就是结构内部各成分的排列组合问题,即在不改变结构本质的情况下,只要将原组合模式打乱,重新安排一下,也就可以给结构自身带来极大的活力,犹如木炭与金刚石在本质上相同,但在外观和效用上有天壤之别一样。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变革,这毕竟是短期内的事情,更多见的乃是同质状态下的自调。中国的“经学”,初变为“汉学”,次变为“理学”,再变为“心学”,到现代又变为“新儒学”,其实也就是通过自调所产生的活力。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自然也是一种自调。那么,文化生产如何审时度势顺乎潮流地进行自调,这是编辑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作为文化产品的“把关人”,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三大要素整体结构中,如何安排它们的组合模式?如果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发,似乎应该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如果从适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似乎又应该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几乎是一个两难处境,但又不能不作出抉择,因为两者的位置即结构的组合模式不同,其整体效用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引入第三要素即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进行自调,这两难处境的抉择便可不言自明。就文化产品的本质特征而言,它虽然也有物质的外壳,也应注意经济效益,但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消费也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即使是为社会的经济服务,也必须通过影响人的精神才能实现。因此,从精神生产的自身规律来说,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必须放在第一位,这也正是当前出版界实现“阶段性转型”的必由之路。而编辑在这一“转型”过程亦即结构的自调过程中,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创造性作用。

注 释:

- ① 向新阳:《编辑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 ② 《礼记·经解》